

宋翰林学士人员结构考述

杨 果

翰林学士是中国封建社会后期中央政府中一种重要的职官。它始建于唐朝,至宋代而制度化,元、明、清时虽稍有厘革,但一直沿置不废。在前后长达一千余年的历程中,翰林学士作为以知识分子充当、替皇帝起草诏命、为君主出谋划策的秘书和“智囊”,产生了深刻的政治影响。宋代是翰林学士制度发展的重要时期,有许多课题值得研究,首当其冲的即翰林学士的人员结构问题。研究这一问题,不仅有助于我们加深对宋代官制的理解和认识,而且可以对我们今天正确选用知识分子或业务类公务员提供某些历史的启迪。

一、出身与出路

作为君主的“机要秘书”,宋翰林学士在人选上最重要的要求就是“非文章不可”^①。而当时文章之士入仕的门径主要就是科举,所谓“朝廷用人,别无他路,止有科举”^②。因此,翰林学士便与科举,尤其是与进士科,形成了一种密切联系,非由科举出身不得入学士院几乎成为一种制度,原无出身者,也往往先赐同出身,而后始官翰林。关于宋翰林学士的出身,笔者根据《宋史》、《东都事略》、《隆平集》、《学士年表》、《中兴学士院题名》等,做过一个统计,得知两宋翰林学士可考者397人,其中350人是进士出身,占总数的88.2%;由其他科名(如举贤良方正、博学宏词、明经、说书等科)而入的16人,占4%;荫补者仅6人,占1.5%;其余25人记载不详。即使这25人皆非科举出身,他们与荫补者的总和也不过占总数的7.8%,只是极少数。而且,据史书记载,这少数人中的大部分也是“博学能文辞”^③之辈,只是由于其他原因而未获得功名。如王益柔,“少力学,通群书,为文日数千言”^④,因不喜诗赋取士而不就科考,后以策论除馆职,神宗时入学士院。韩维,曾以进士奏名礼部,值其父韩亿执政,维避嫌不就廷试,后用荫得官,神宗时迁翰林学士。《宋史》本传称其“好古嗜学。”钱勰,十三岁便“制举之业成”,熙宁间曾应试入选,“会王安石恶孔文仲策,迁怒罢其科,遂不得第”。

有无科考功名,是赵宋君主选用翰林学士最主要的依据。徽宗崇宁五年还曾明文规定:“翰林学士、两省官及馆阁,今后并除进士出身”^⑤。有宋一代,这条规定是基本执行了的。

科举制度是封建选官制度,其核心在于唐太宗所言:网罗“天下英雄尽入吾彀中”,政治上的局限性是显而易见的。但是,它毕竟使用人行政有了一定的标准。具有较高封建文化修养的士人经科举选拔入居翰林,从而在人选上保证了翰林学士职能的较好发挥。一般来说,宋翰林学士草诏效果很好,虽有象“彭乘为翰林学士,文章诰命尤为可笑”^⑥的,但多数是诏令文书行下,“激励奋发,足以感泣三军;勤拳淳复,足以警惕百揆”^⑦。至于咨询顾问的影

响,更是不可低估,“经营庶务,进退大臣,未尝不预咨询”^⑧。翰林学士充分运用自己的才智谋略,当好皇帝的智囊,在研究、提供决策方针和评价、选择决策方案这两方面发挥积极作用,从而对宋代政治产生重要的影响。

在“崇儒右文”的宋代,君主既公开声称“宰相须用读书人”;民间更普遍流行着“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的观念。因此,既有科举出身,又随侍君主左右、为其赏识的翰林学士,便成为宰相执政当仁不让的候选人。充任宰执,成为翰林学士的一条主要出路。不由翰林学士不除中书、枢密院二府,成了一种惯例。景祐中,仁宗欲以知制诰宋庠为同知枢密院事,就曾遭到当朝宰相反对,“以故事未有知制诰除二府者,乃改翰林学士。明年,遂除参知政事。”^⑨由学士升为宰执有多种情形:有的是改转他官后再迁任为宰执,有的则直接登入“二府”,有的甚至在大除拜草词之际被同时任命,人称“润笔执政。”徐度《却扫编》卷上“韩康公、王荆公之拜相也,王岐公为翰林学士,被召命词。既接旨,神宗出手札示之曰:‘已除卿参知政事矣。’国朝以来,因命相而遂用草制学士补其处,如此者甚多,近岁亦时有之。世谓之‘润笔执政’。”

根据笔者的统计,两宋时期翰林学士位至宰执的共计193人,约占总人数的1/2,数量是可观的。宋人有关“满朝金紫贵,尽是读书人”的诗句,正是这种局面的真实写照。

由进士而入翰林,经翰林而拜宰执,由此构成了宋代文人趋之若鹜的仕进“三部曲”。宋代的许多名臣,如吕蒙正、晏殊、富弼、毕士安、欧阳修、王安石、司马光、曾布、章惇、真德秀等人,都是经历这样的“三部曲”而后闻达于世的。这种状况的出现,进一步促成了唐代开始的文人政治的完备,从而使中国封建社会后期的政治显现出与前期世族门阀把持政权的门第政治迥然不同的面貌。

二、家庭背景

两宋翰林学士397人,其中在《宋史》上有传的264人,而载明了家世的不过101人,不到1/2。并且,这百余人中有“世为农家”的王禹偁,“微时苦贫”、赖朋友“捐数百千”方得娶妻的王陶,“家贫无膏油,每拾薪苏以继晷”的汪应辰,以及幼孤“家贫、至以获画地学书”的欧阳修等等^⑩。其他如张守、张方平、王曾、李迪、柳植、吴奎、李至、梁颙、蔡齐、马廷鸾……等人也都出身贫寒。称得上名门望族的只是个别人,如陶穀。官宦子弟为数也不多。至于本传不言其家世的大部分人,除了少数是由于情况不明无法记载外,其余多数大约还是因为父祖平平,门楣无光,没有什么值得一书的。

庶民布衣、贫寒子弟何以入居君主的辅弼?靠的还是科举^⑪。如前所述,科举考试使用人行政有了一定的标准,不仅如此,更为重要的是它打破门第的观念,为庶民提供了一条仕进大道;它被视为公平原则,在人们心里引起了强烈的震动。科举成为社会心理的鹄的,无论将相之子或苦寒之士,人人冀求一第而后天下知,飞黄腾达,安富尊荣。即使是封建时代,文化知识从本质上说仍是全人类的精神财富,不可能被某一个人,某一个家族垄断。于是宋代的寒门布衣可以借助于当时相对安定的社会环境、相对开放的政治局面以及空前发达的文教事业,面壁苦读,应举中第。赵宋政权通过科举考试将一些原属被统治阶级中的优秀分子吸收进来,出发点是为了让社会各阶层的人都保持对政府的向心力,并使自己的统治“越巩固,越险恶”^⑫。但客观上有利于政治的清明,同时促进了教育的兴盛,刺激了读书风气更加浓厚。

虽然文化知识不具有世袭性,不能靠遗传方式来获得,但经济条件优越、文化积累丰富

的家庭，其子弟读书应举要比一般庶民便利得多。因此，宋翰林学士中有18%的人是父子相承（如李昉与李宗谔，晁迥与晁宗慤）、兄弟接踵（如窦仪与窦俨，韩绛与韩维）、祖孙叔侄先后入院（祖孙如张洎与张洙，叔侄如高定子与高斯得），甚至一家数代连登禁林的（如范镇与其从子百禄、从孙祖禹、曾孙冲）。其详情可参见《宋史》。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属于上述情况的72人中，仅钱惟演、钱勰、韩维和邓洵仁4人没有科名，除了邓洵仁一人情况不详外，其余3人都是本文第一部分所提及的富有文才而因其他缘故而未应举及第之辈。换言之，上述70余人得以步入翰苑，靠的仍是科举，是个人的才学而非门第，这与以往的门阀政治有天壤之别。

三、地域分布

根据《宋史》、《东都事略》、《隆平集》、《名臣碑传琬琰集》和部分宋人文集，宋翰林学士籍贯可考者352人，约占总数的89%。

就地理位置来看，翰林学士中比例最大的，无论北宋或南宋，都是两浙路人（北宋时占总数的14%，南宋时达34%），其次属福建路人（北宋时占10%，南宋时占14%），再次成都府路人（北宋时占10%，南宋时占8%）及江南东、西路人（北宋时江南西路人占6%，居诸路第四；南宋时江南东路人占13%，仅次于两浙、福建）。而秦凤、夔州、广南西三路，了无1人。广南东路，仅有仁宗时的冯元1人，而且实际上自太祖平广南后，冯元的父亲冯礪便“入朝为保章正”，冯元本人则“幼从崔颐正、孙奭为《五经》大义”^③，以后登第做官，始终在京都一带生活，严格地说，算不上是广东人。

分时期而言，北宋以仁宗朝为界，前后两个时期的面貌显著不同。仁宗之前的太祖、太宗、真宗三朝，翰林学士中的北方人占绝对优势，分别为当时总数的89%，78%，70%。特别是太祖时期，先后任用的9个翰林学士，除欧阳迥一人是留用后蜀旧官外，其余8人都是生于斯长于斯的北方人。仁宗朝情况大变，南方人大幅度增长，其百分比从前代的最高不超过30%猛增到近60%。以后的各朝保持了这一趋向，南方人始终远远多于北方人。南宋偏安江左，因而除了最初的高、孝两朝尚有少数南迁的北方人入居翰苑外，以后便绝了踪迹。

从上述地域分布情况，人们可以得到哪些启示呢？至少有以下两点：

其一，文教水准的高低，与当地经济发展水平密切相关。从某种意义上来说，选自进士高科的宋翰林学士，是封建文化的代表人物。如前所述，这些人集中于以太湖流域为中心的两浙路，以及东南沿海和四川盆地，而这些地区正是宋代经济最为发达的地区。特别是两浙路，农业上的精耕细作、集约经营，使之成为宋代著名粮产区，北宋时被称为“国之仓庾”^④，南宋时更有“苏湖熟，天下足”之美名^⑤。号称“天府之国”的四川盆地和福建濒海地区，其精耕细作、稳产高产也可与两浙差肩比美。经济的繁荣，促进了这些“俗本好文”的地区文教事业的发达。富民既有财力兴办教育，官府也大力扶植州县之学。于是，官私学校林立，读书应举蔚然成风。出于同一道理，在地旷人稀、自然条件较差、仍盛行“刀耕火种”的夔峡之地，广南东西路大部分地区，文化教育也不发达。虽然南宋以后不少偏远州县都纷纷建立了学校，无奈人才的培养并非朝夕所能奏效的，而是需要较长时间的积累，但南宋很快就国将不国，这里的读书人也就根本没有机会一试身手了。

其二，在封建专制制度下，仕途中人的升降动向往往系于最高统治者的用人政策，甚至取决于君主的个人好恶。这本是封建政治的“人治”原则的结果，而翰林学士的“天子私人”性质更使之成为必然。两宋时期，翰林学士的除授完全由皇帝亲自掌握。《宋史·苏轼传》有

一段记载，可以说是概括翰林学士得官途径的最好资料：

(苏)轼尝锁宿禁中，召入对便殿，宣仁后因曰：“今为何官？”曰：“臣今待罪翰林学士。”曰：“何以遽至此？”曰：“遭遇太皇太后、皇帝陛下。”曰：“非也。”曰：“岂大臣论荐乎？”曰：“亦非也。”轼惊曰：“臣虽无状，不敢自他途以进。”曰：“此先帝意也……”

这段记载告诉我们：翰林学士入院途径有两条：一是皇帝擢拔，二是大臣荐举，此外“自他途以进”的，为士人所不取。当时情况的确如此。不过，严格地说，作为“天子私人”的翰林学士完全是由皇帝控制的，两条途径归根结底是一条——皇帝擢拔。大臣论荐实际上是皇帝擢拔的预备阶段，大臣向皇帝提供候选人，然后由皇帝加以裁决。大臣的推荐采用与否，最终还是皇帝作主。唯其如此，所以北宋初年的翰林要员十之七八是北方人，起家于宋州（今河南商丘）之地的君主自然而然地把风俗习惯、心理语言等都与自己接近的今河南、河北、陕西、山东人安置在身边，充当辅弼。直到真宗在位，不仅随侍左右的翰林学士，就是朝廷重臣——宰辅，也仍是以北方人为主，以至江西人晏殊廷试突出，陕西人宰相寇准却以“殊，江外人”为理由反对赐之为进士^⑩。由此可知，太祖、太宗、真宗三朝，能跻身翰苑的江南士人寥若晨星，是毫不奇怪的。难怪宋人说：“天圣以前，选用人才多取北人，……故南方士大夫沉抑者多。”只是到了仁宗时期，“仁宗皇帝照知其弊，公听并视，兼收博采，无南北之异”，南方士人才各得其所。而到了“绍圣、崇宁间，取南人更多”，反过来成了“北方士大夫有沉抑之叹”了^⑪。封建时代统治者的用人政策对人才盛衰的影响之大，无论怎么估计都是不会过分的。

总的来看，赵宋政权以科举简选“道德文学之流”进入翰林，并擢拔其中的一些人入居宰辅，这样做的结果，对统治者而言，不仅可以从人选上保证翰林学士职掌的较好执行，而且能够网罗社会各个阶层的优秀分子，从而有利于政权的稳固。对芸芸士人来说，无论将相后代或布衣之子，功名利禄可望可及，于是人人寒窗苦读，以求列位公卿。伴随着社会向上倾向迅猛扩展的，既是社会阶层加速的流动，同时又是文教事业空前的发达和民众文化素养大幅度的提高。如果说文教事业受统治政策的影响，那么人才消长则为统治政策所左右。南方士人在北宋初年郁郁不得志，最直接的原因就在于此。然而，人才消长的终极前提仍是经济发展的水平。因此，在经济增长的江南地区，文教事业兴旺，人才大量涌现。宋翰林学士多以南方人充任，最根本的原因就在于此。

注 释：

- ① 钱惟演语。引自《欧阳修全集·居士集》2，“内制集序”。
- ② 张端义《贵耳集》卷下。
- ③ 《宋史》卷317，《钱惟演传》。
- ④ 《宋史》卷286，《王益柔传》。
- ⑤ 《宋会要稿·职官》3之10。
- ⑥ 魏泰：《东轩笔录》卷9。
- ⑦ 郑真赞王应麟制草语。引自《四明文献集》卷4。
- ⑧ 曾巩：《元丰类稿》卷20，“中书舍人除翰林学士制”。
- ⑨ 叶梦得：《石林燕语》卷3。
- ⑩ 均见于《宋史》本传。
- ⑪ 文中提到的那些人没有一个不是由科举入仕的，而且，除张方平中制举、吴奎举五经外，其余全部是进士出身。梁颢、王曾、李迪、蔡齐、汪应辰和欧阳修、王禹偁、马廷鸾等人还分别中过状元或省元。（参见《宋史》本传，《通考·选举五》）
- ⑫ 马克思：《资本论》卷3。
- ⑬ 《宋史》卷294，《冯元传》。
- ⑭ 范仲淹语。《范文正公文集·政府奏议》卷上《答手诏条陈十事》。
- ⑮ 高斯得：《耻堂存稿》卷5“宁国府劝农文”。
- ⑯ 《宋史》卷311，《晏殊传》。
- ⑰ 陆游：《渭南文集》卷3。